兵学谈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柔武论*
——中国古典战略旨要

近年来，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研究中，谋略文化是一个热门课题，尤其是古典战略文化更加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佳作迭呈，成绩斐然。但是也有一些论著治丝愈棼，列出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战略策略，反倒使人们坠入五里雾中，不得要领。因此，对于古典战略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如何从总体上加以把握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中国古典战略，几千年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而不断地被人们加以扬弃和承传。但是，它那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战略自古至今并没有变化，这就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防御战略，古人称为“柔武”兵略。淘

此文载于《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1期。

尽尘沙始到金，“柔武”二字就是中国古典战略的精义之所在。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可以从历史留传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承受而已，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公有物，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今天，我们研究柔武战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立足于现实，探循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服务于国防现代化事业。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是严峻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事关民族命运，国家兴衰。从古代战略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今天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就会发现，中国要在下个世纪找准迅速崛起的历史定位，传统的柔武战略和策略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柔武的涵义及其产生的军事文化背景

（一）柔武溯源

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一对包容性很大的范畴，就是刚柔。刚柔即指阳刚与坤柔，反映在军事上，阳刚代表强大、进攻；坤柔代表弱小、防御。古代兵学家用“以柔克刚”来表述军事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以防御挫败进攻等等战争现象。

这种“以柔克刚”的思想早在西周时代就已见诸史籍。《逸周书·柔武》写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意思是说，所谓柔武就是要善于巧胜而不硬拼。《柔武》篇原是论述周武王元年武王与周公的谈话内容。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典型的以弱胜强的战争，在战争指导上充分体现出隐忍静柔的战略策略思想。这场战争的主要指导者是吕尚（姜太公）。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吕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也就是说，周族灭商的胜利靠的是吕尚的权谋奇计，诸如荫蔽企图、麻痹商纣、广结诸侯、乘虚蹈隙等一系列柔武之策。可见，说吕尚是权谋奇计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虽然吕尚在战争实践上创造和实现了柔武战略，但是，真正从观

念形态上使柔武战略理论化、系统化，则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学家逐渐完成的。《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耽贵柔”。《老子》是第一部从军事哲学的高度论述柔武理论的杰出兵书，它明确指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自《老子》之后，《孙子》、《墨子》、《尉缭子》、《管子》、《文子》，到秦汉的《三略》、隋唐的《卫公兵法》、《太白阴经》、明代的《兵经》等都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对柔武理论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发表了不少气势恢宏的高言妙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兵学家眼里，以柔克刚并不是个别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列子·黄帝》指出：“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刚。”

中国古代的兵法大多是哲学语言，大多是格言式的论断组合，常常是寥寥数语就表达出无限的含义。因此，读古人书，释古人意，常常难以把握，难以捉摸。因为古人不善于逻辑分析方法，而是靠直觉思维方法去意会对象。因此，我们要理解它的真谛，就必须不断地去体验、领悟，才能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识得庐山真面目。

刚柔这一范畴正是古典战略的精髓。它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战略策略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思维框架。这个思维框架虽然由于缺乏定量分析而未能对战略对象进行分门别类，虽然由于缺乏科学实证而未能对战略研究进行具体的层次解剖，但是，它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战斗力，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代代相传，不断得到后人的充实、丰富和发展。在这种承传、改造、创新的历史过程中，“柔武”战略终于在祖国的战略文化中获得了最一般的表现形式，成为相对独立的宝贵的历史遗产。

柔武战略的思维框架，涵盖了古代兵法中的庙算、主客、虚实、奇正、形势等等众多的概念。从现代军事学的角度去看，可以说，柔武是一个包容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泛概念。这不是无根之谈。柔武观虽然产生于西周时代，但自周秦以后每个时代的兵学家都根据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处时代的需要赋予其新的涵义，这就使它愈来愈脱离产生时代的历史背景，从而扩大了原来仅指一般作战而言的起始含义。

还要看到，与西方机械的思维观念不同，柔武战略观正是中国有机思维观念在军事学上打下的明显印证，它表现出宏观、整体的思维特征，强调把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进行统一的把握，综合分析运用。今天，人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精确思维之后，再度关注中国古代兵法这一极古老而又极富思辨的思维方式，并以之作为现代战争理论的补充，意义非同寻常。

（二）柔武战略产生和形成的军事文化背景

中国古典战略是多元的。在长达五千年的军事历史长河中，战略类型既有进攻的也有防御的，既有稳健的也有保守的，既有冒险的也有畏缩的。总之，既有阳刚乾雄的，也有阴柔坤雌的，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人在创造自己绚丽多姿的战略文化的同时，又为这一战略文化定下了自己的基调，这一基调就是隐忍静柔的柔武战略。表面上看，以柔克刚似乎是道家的思想。其实不然，只要我们对它产生的文化背景略加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柔武战略所特有的慎谋观念、远谋观念、全胜观念等等，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慧根，正是中国古典战略的主旋律。

首先，它是中华民族应对自然环境挑战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发源于中原，然后向四周扩展，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然而几千年来，中国人面对的地理环境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环境。北面是荒漠草原，西面是青藏高原，东面和南面是茫茫大海。中华民族的文化圈就局限在这一天然的界限之内。在这一文化圈中，农耕文化占着主体地位，并且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虽然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却未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封闭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造就了求稳求静、坚韧不拔、推崇集体力量的国民心理趋向。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居安思危”“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等一系列战略品格。

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战略文化的柔武

观便是民族战争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正当中原诸侯列国争霸图强之际，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几十个部族和方国已对华夏民族构成严重威胁。自秦汉以后，这种国内民族战争连绵不断。面对兵连祸结的现实，北方居民大量南迁，因此也促进了长江以南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南移。农耕民族为了确保自己安居乐业，对于游牧民族的掠夺和入侵，只有一个战胜之法，那就是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

柔武战略可以理解为防御战略。这一战略传统不仅是中国古代兵家群体经验的结晶，而且成为今天中国战略家的大智慧。外国有人这样写道：“中国战略传统是以强调防御为特色的”，直到现在，“在大战略的层面上，这一原则的应用可以解释为什么邓小平和其他有过军事经历的共和国领导人不断重申中国是个弱国、穷国和没有能力的国家。在 1984年 6月 21 日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讲话中，毫无荣耀、自夸的语言。相反，他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话很明显地表现了邓的思想。他认为说中国是个弱国，并不会损害中华民族的士气，反而能增强内在的凝聚力和民族的决心。”

二、柔武战略的内在机制

（一）守柔——柔武战略的核心

一般而言，阴柔是内向的、隐秘的，弱小的，防御的；阳刚是外向的、暴露的，强大的，进攻的。弱小之国面对强国的欺凌，弱小之军面对强敌的进攻，战略上处于守势，处于防御。为了保存实力，待机胜敌，就应守柔。《老子》说“守柔曰强”，“不争而善胜”，《孙子兵法》说“先为不可胜”。守柔对己是蓄锐，对敌是避锐。从形式上看，似乎是消极的，被动的，但是实质上是外柔内刚，柔中有刚，棉里藏针。暂时的“不争”，正是为了将来“与之争”。政治外交上的“不争之争”才称得上是“善争”，军事上的“不动金鼓”之争才称得上是“善阵”。

在古代兵家那里，柔弱不是软弱。《老子》说：“柔弱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这就是说，阴柔代表的是具有蓬勃生气的、生动灵活

的新生事物，代表的是具有必胜信念的正义之师。反之，那种貌似强大、不可一世、到处伸手的阳刚者却是代表一种垂死的、衰败的事物。所以《老子》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守柔是一种战略上的智慧控制术。以强凌弱靠“豪夺”，而以弱胜强则要靠“巧取”。巧取，争的是智，以智取利，以智斗力，以智斗智。

从策略的角度考察，守柔与韬光养晦是同义语，主张扬阴避阳，毁迹藏形。我们仍然以吕尚为例，略作分析。当年吕尚在渭水之滨究竟向周文王发表了什么高见，《史记》没有记载。但司马迁告诉我们，周文王兴奋地对吕尚说“太公望子久矣”，并且当即任命吕尚为“师”（相当于今日总理兼国防部长之职）。《资治通鉴外纪》透露了一点吕尚言论的吉光片羽。吕尚对文王说：“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要文王在时机尚未到来之时，装作无所作为的样子。这就是守柔策略，韬晦策略，以屈求伸策略。

仅次于吕尚的柔武战略家就是范蠡。他在协助越王勾践的灭吴斗争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范蠡为谋主，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以一个弱国打败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吴国。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的政治集团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集团，尽管它在同强者斗争的开始阶段柔如春草，但只要它代表的是新生事物，就最终都能运用守柔的战略策略战胜实如枯槁的强敌。蒙古民族成吉思汗之对金朝，女真民族努尔哈赤之对明朝都是成功的史例。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面对多极斗争的国际形势和西方对我实行“西分”“分化”的图谋，要想从发展中崛起，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正确的策略选择就是守柔。正如《管子·霸言》所说，应“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为我们制定了著名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国家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浸润着浓

厚的中国古代柔武战略文化的色彩。他告诫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只有冷静才能认清形势，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只有稳住阵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我们必须“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只有沉着应付，创造有利的战略环境，才能打好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邓小平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一方面我们力量不够，这个头我们当不起；另一方面，当头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不当头，不称霸，努力发展自己，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一国策不是软弱，而是棉里藏针。邓小平以其革命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明确表示：中国肯定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毋庸讳言，中国古典的柔武战略对于我们仍然具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富国强兵——柔武战略的基础

富国强兵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战略，也是中华民族努力追求的奋斗目标。富国强兵这一命题有着丰富的内涵，自从先秦诸子提出这一国家战略之后，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根据当时的国情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使之更加系统，更加完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富国强兵战略因时代不同而表现出多么不同的时代特征，但是，在先富国后强兵、边富国边强兵、以富国为基础这一点上始终是相同的，《管子·治国》的表述最有代表性，它说：“民事农则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近代的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不少有识之士又重新举起富国强兵的旗帜，并明确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

这一先富后强，力求富强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其富国强兵战略，但它的发展道路是以强致富，崇奉的是掠夺殖民地的炮舰政策。在东方文化圈中，只有日本这一儒教国家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战略思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吉田松荫、山县有朋这些政治家明确主

张把日本国策的根本放在强兵上面，把强兵视为富国之本，以建立“武国”作为政治信条，通过对外推行殖民政策，通过对外侵略扩张达到富国的目的。

“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对于今天的中国，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看，还是从今天的中国国情看，依然没有过时。中国要发展、要崛起，要立于世界之林，仍然要走一条同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道路，这是现实的惟一选择。

富国与强兵虽然有一个基本点问题，有一个发展顺序问题，但是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有机联系的。因为柔武虽然是防御的，但防御毕竟要以军事力量为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对别国实行威慑战略。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必须拥有一定的威慑力量。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就说要“搞一些原子弹、氢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邓小平也曾指出，我们发展核武器“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你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点报复”。总之，高超的策略艺术和坚强的综合国力，构成了柔武战略的两翼，二者缺一不可。

（三）后发制人——柔武战略的要求

军事上的通则是强胜弱败、优胜劣败。柔弱要战胜刚强，必须实现主客易位，强弱易势。在这里，对立的双方各自向对立面转化乃是以柔克刚的精义所在。刚与柔既有对立性又有同一性，即所谓刚柔相济，刚柔相推。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包括军事运动在内的天下万物“无成势，无常形”，敌对双方处于变化之中，相反可以相成，相生可以相害。《孙子兵法》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人的能动作用，治乱、勇怯、强弱可以互相转化。从战争伦理学的角度看，哀兵必胜。后发制人可以静观形势变化，可以赢得广泛支持。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化。《老子》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意思是说，要想使强大的敌人变为弱小，那就必须使它超过强大的限度。中国古代的兵家很讲究“度”，《尉缭子》说：“无过

在于度数。”通俗地说就是掌握火候。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穷极生变，物极必反。古往今来，多少称王称霸者无一不是利令智昏、穷兵黩武而走向灭亡的。比如说，吴王夫差的败亡，就是因为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先后同楚、齐、晋三个大国兵戎相见，自以为得计。正当他北威齐晋、霸业达到顶峰时，由弱转强的越国后发制人，避实击虚，突然袭击，一举灭亡了吴国。现实的例子更是殷鉴不远。冷战时代，苏美两霸由于拼其国力进行军备竞赛，前苏联解体了，美国也伤了元气。

要使强大的敌人向对立面转化，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和具备一定的条件，不能急于求成。因此，对于弱小的一方来说，后发制人便是惟一正确的策略。关于后发制人，范蠡的论述既古朴又完善，他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意思是说，阴柔弱小的一方以后发制人为通则，阳刚强大的一方以先发制人为通则。弱小之军面对强敌的进攻应采取防御作战的形式，待到进攻之军锐气用尽，防御者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之后，就可以反守为攻，战胜进攻之敌。

“智出乎争”。后发制人决不能守株待兔，必须充分运用各种斗争艺术削弱强敌。诸如伐谋伐交，避实击虚，示形造势，奇正多变等等都是众所熟知的战略策略。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计数”问题。《管子·七法》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又说：“明于机数无敌。”数学是智慧的结晶。马克思说过，在军事领域中“带有若干个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是一种“内部隐蔽着的规律”。中国古代的兵学家很早就把运筹思想运用于军事领域，并且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形式和方法。运用得好，常常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大家熟悉的孙膑赛马的史例是有典型意义的。孙膑在六种排列组合中，选择了惟一可以获胜的一种组合。司马迁在《史记》中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个赛马故事，目的在于说明孙膑后来在齐魏桂陵、马陵之战的胜利，就是孙膑对策论思想在军事上所取得的以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胜强的生动反映。由此可见，数学在军事上也是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孙子兵法》第一篇论述的就是数学问题。《计篇》的‘计”,就是计算，通过数学分析制定出战略决策。据《六韬》记载，早在先秦时代军队中就设有“法算”、“会计”等从事计算的专职人员。马克思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发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成为战略争夺的制高点。要想赢得主动，我们必须像当年研制原子弹、氢弹那样，迎头赶上，尽早在信息技术上立于不败之地。

（四）静幽正治——柔武战略家的品格

《孙子兵法》有句名言：“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这里，“静”意为沉着冷静，“幽”意为深谋远虑，“正”意为公正无私，“治”意为条理井然。孙子不仅对将帅的德才要求曾提出过著名的“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而且又从性格情操上提出“静幽正治”四项要求，这些无疑都是优秀将帅必须具备的条件。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实施柔武战略达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目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愉快的、轻而易举的事；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必须经历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的战略。也就是说，以柔克刚较之于以刚克柔，前者是持久的、艰难的、痛苦的，而后者是快速的、速成的、愉悦的。因其如此，柔武战略家个人的品格及其人格力量就对战争的胜负常常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分析一个史例。楚汉战争中，刘邦是弱者，项羽是强者。刘邦为了实现以弱胜强的战略，与他的父母妻子，与他的军队，遭受了一系列挫折。但他面对种种挫折真正做到了抑情制怒，高度冷静，忍小忿而顾大谋。例如有一次，项羽以烹杀他的父亲相要挟，宁肯斗智、不肯斗力的刘邦回答项羽说：我们曾结拜为弟兄，因此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烹杀我们的父亲，请分给我一杯肉汤喝。刘邦这番话固然回答得很艺术、很泰然，但是在他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然而，刘邦之所以成为刘邦，正是因为他具备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理智，具备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忍受极度痛苦的能力。仅从这

一点看，他同“妇人之仁”的项羽相比已经高出一筹。由此可见，高度的理性和坚强的意志乃是柔武战略家必不可少的人格精神和性格修养。

“静幽正治”之所以成为军事家的澡雪精神，乃是战争这一特殊事物决定的。由于兵凶战危，因此，孙子告诫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考虑战争问题要顾全大局，要洞察形势，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一个战争指导者，尤其是一个柔武战略的指导者，就必须具有独特的理性、智慧和韧性。

以上对柔武战略思想的合理内核作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这无疑是初步的、肤浅的。当我们在吸收柔武战略传统的民主性精华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清楚地看到，历史传统是一把双面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孕育、成长于中国封建文化硬壳里的古代战略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保守、调和、退让，没有激情，不求进取等封建文化的孽根性必然反映在古代兵家的战略理论的著述之中，这些缺陷与它的优长如兰艾并生，是矛盾的、自律背反的。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鉴别和剔除。不仅如此，即使是古代经典的高谋长策，也不是“拿来”就可以用，或者略加“现代化”的解释就成了经国治军的良方。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启迪和借鉴，而不是现成的答案。

答研究生问

—— 中国古代战略观念的历史文化渊源 *

问：您写的那篇《柔武论》，我们已拜读了，其中谈到了中国古典战略的主旨，对我们很有启发。现在，想请您对中国古代战略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谈谈看法。

答：探索历史文化的渊源无疑是破译中国古典战略之谜的钥匙，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然而，五千年的中国军事文化，问题相当复杂，内容相当广泛，它不仅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尽述，也不是靠几个人的研究就能胜任的。这就好象分辨黄色、白色、黑色和棕色人种在体质形态上的不同特征是容易的，而要说明为什么具有这些不同特征就困难得多了。作为学术探讨，对于提出

此文载于《中国军事科学》 1997年第 1期。

的这个问题，我可以试作一答。

我觉得探讨这个问题大概有四个着眼点：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战争的统一趋势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实，这四个方面我曾经在《柔武论》一文中谈到了一些，这里先谈谈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

中华民族面对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北面是荒漠草原，西面是青藏高原，东面和南面是茫茫大海。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圈，古人所谓的“天下”，所谓的“海内”就是指的这个范围。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今天，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其中，汉族（古代华夏族和其它民族的混合体）占绝大多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表征。中国古代的战争数以千计，由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民族很少受到异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因此，古代的绝大多数战争都是在中华民族内部进行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战略的总的历史背景。

问：民族战争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否只是一种类型？

答：是的。中国古代战争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民族战争，主要的、大量的是国内民族战争，但也有少数同异民族的战争，如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军之类；二是汉族政权的兼并战争，春秋以前的奴隶制兼并战争，战国以后的封建兼并战争；三是农民革命战争。我说的是三大类，大类下面的小类略而不论。这三大类战争中，凡大规模的战争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即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社会的进步。因此，我在前面谈到的四个着眼点中有一个是战争的统一趋势。无疑，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文化传统，也是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战略思想资源。

问：您是不是以今天中国的陆地疆域为标准去规范古代民族战争的概念？例如辽金夏，当时它们是一个一个的政权，一个一个的王朝，并不是统一的国家，难道他们当时也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吗？

答：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今天的中华民族也是历史

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度。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战争以来，民族（部族）战争就客观存在，自此以后，连绵不绝。但是，我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以今天中国的疆域去硬套古代历史事实。让我们以匈奴为例，看看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是怎样记述其渊源关系的。

《史记·匈奴列传》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匈奴如此，其它民族也如此。

问：匈奴民族曾经雄踞北方，它同汉朝进行过长期的规模巨大的战争，那么，汉匈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什么地位呢？

答：因为探讨的是战略观念的历史文化渊源，我们可以以汉匈战争为例，切入所要探讨的主题。

汉匈战争属于国内民族战争。如果说先秦时代华夏民族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还是各自独立的民族集团，那么，汉朝的建立就标示着汉族的形成——尽管汉族这个名称始于魏晋。汉匈战争便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同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进行的国内民族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可否认，秦始皇统一六国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但是，他统一的范围还是有限的，而汉匈战争则从更大范围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当时匈奴控制的范围东起今天的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至贝加尔湖一带，西至祁连山、阿尔泰山一带，南至河套地区。在这么广袤的地区实现国家的统一，其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从军事上看，汉匈战争是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较量。逐水草而居的匈奴民族过着游牧生活，食畜肉，衣皮革，住穹庐，长于骑射，善于攻战。更加之尚处于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受其掠夺的本性所驱使，奴隶主贵族集团常常对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形态的汉

朝发动掠夺战争。汉唐以后虽然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一般要落后整整一个社会形态，但战争却是胜多败少。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汉唐正处于封建社会上行期，并据有东北、华北、西北大量的产马区，在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彼此有胜有负。南北朝之后出现隋的统一，五代十国之后出现宋的统一；而自宋朝开始，由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燕云十六州被辽朝占有后，辽朝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几乎控制了全部产马区，加之他们相继进入封建社会，于是，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整个民族战争的战场从中国北方打向南方，西方打到东方，最后以进入封建社会形态并兼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满族建立了清朝。

问：游牧民族既然在军事上占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为什么您又说中国古代战略占主体地位的是农耕文化的战略观念？

答：农耕民族在同游牧民族的斗争中，有两种方式，一是战胜，如汉朝战胜匈奴，唐朝战胜突厥；二是同化。马克思指出：“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古代史上，汉民族同化了许多少数民族，谁若拒绝这种同化，谁就会像蒙元统治者那样，最后不得不退回荒漠草原去。正是基于这两种方式，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始终占据着主体地位，反映在军事上，中华民族主要的传统战略观念首先是阴柔的、防御的、中和的，其次才是阳刚的、进攻的、冒险的。

问：直白地说，您是不是认为骑兵难以抵挡是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答：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修筑长城最能说明这一点。冷兵器时代，乃至冷热兵器并用时代，游牧民族的集团骑兵，再加上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制度作保障，是一支很难抗御的军事力量。战国时代修筑的长城在很大程度上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则纯粹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骑兵的南犯。

问：唐朝和宋朝为什么没有修筑长城？

答：修筑长城必须“因山为之”，宋朝既失燕云十六州，定都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